

学术 视点

推进古籍出版事业繁荣发展

——中华书局总编辑周绚隆访谈

本报记者 张丽

注重扎实文献阅读基本功

学术家园: 几十年来,您主持或参与多个中国古典文学文献的系统性整理出版项目,您自身也从事相关学术研究。首先,请就此谈谈您对加强传世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的经验与思考。

周绚隆:我是明清文学专业出身。还记得那是1996年前后,我在学习与研究过程中,发现基础文献整理很不系统,很多基本古籍找不到。当时就在想,如果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把这些古籍系统整理出来,以方便更多学者研究使用。博士毕业后,我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后来主持古典文学编辑部工作。该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全国各地网罗了一批专家学者来做古籍整理,后因出版分工的调整等原因,古籍整理板块逐渐变弱。我到该社时,古籍整理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相当于从零做起。于是我面临一个方向问题,即做什么的问题。

从品牌建设来讲,古籍整理是衡量一个出版社专业出版能力的重要标杆,也是考验编辑能力的重要出版类型。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编辑,刚参加工作都会发现,在学校时因为一直侧重理论学习,文献的阅读量往往不够,处理能力都会有欠缺。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在做“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即面对这样的普及类书稿,刚参加工作时,我都明显感觉到自己处理起来有些吃力。通过参与高难度项目,能快速提升专业编辑的专业技能。

考虑到中华书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当时在古籍整理领域实力雄厚、产品丰富,我就决定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集中力量,做明清集部文献的整理出版。这样做一是能快速建成产品线,二是能让新入职的编辑得到集中锻炼和提升,尽快熟悉一个阶段的文献,成为该领域的专家。经过多年积累,如今看来,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取得的成绩也是明显的,不仅建成了产品线,也树立了品牌,还在此过程中,锻炼了一支专业技术过硬的编辑队伍。

学术家园: 当前学界在古籍整理方面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基础的现象,出版机构应如何作出引导?推进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

周绚隆:做好古籍整理工作,需要将学术力量与出版力量有机整合。随着专业化发展,古籍整理的主体是学术界,繁荣古籍出版事业,必须借助学术界的力量。但是古籍整理所涉及知识点比较琐碎且繁多,单靠一名或几名学者,很难达到出版标准,这就需要有专业编辑把关,这对保证图书质量至关重要。

在我看来,推进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的主要意义在于改变学风,让学者在治学时注重基础,保持踏踏实实的态度。当前由于学术界的考评体制等因素,学者总体上侧重理论性研究,整理文献与阅读文献的功夫能力下滑。我经常会在一些学术论著中发现征引文献有断错句的现象。从事学术研究,遇到不懂的材料,可能会绕开,但从古籍整理,遇到不懂的地方,既不能绕开,也不能似是而非,你根本无法藏拙,错了就是硬伤。从

编者按: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对加强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提出了新要求,古籍事业发展面临新机遇。中华书局是传统文化出版重镇,在古籍整理研究、编辑出版与普及传播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华书局总编辑周绚隆,长年致力于古典文献与文学的整理出版。本期学术周刊专访周绚隆,请他结合《意见》,谈谈如何更好地推进新时代古籍出版工作,以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周绚隆

学术层面看,只有将文献工作做扎实,才可能将理论研究做得更深入。现在有些学者写东西往往主题先行,然后只找有利于自己的材料,得出的结论貌似合理,其实可能并不可靠。这样的研究不利于学术的可持续发展与深度发展。

古籍数字化助力学术创新

学术家园: 近年来,中华书局高度重视古籍数字化,并与清华大学联合主办了中国大陆地区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数字人文学期刊《数字人文》。请您谈谈,中华书局在古籍数字化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这对促进新时代古籍保护与传播有哪些助力?对完善相关学科专业体系建设,提供了哪些参考?

周绚隆:中华书局在国内出版业中,古籍数字化做得较早。中华书局于2015年便成立了全资子公司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古籍整理数字化、数字化出版与数字化产品的研发,以及多类型古籍数字化产品,所建立的“中华经典古籍库”畅销海内外,古籍自动标点系统等先进技术,编辑培训等服务效果明显。

“中华经典古籍库”的特色在于,囊括了除上海古籍出版社外的全国古籍出版社已整理出版过的古籍成果,学者可直接使用。近年来,“中华经典古籍库”不断扩展与细化,比如开发了专题数据库,服务于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研究,相较老一辈学者靠工具书检索,要方便得多。

学术家园: 古籍数字化,对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建设的创新发展,具有哪些影响?

周绚隆:过去开展学术研究,主要靠阅读大量图书来逐渐积累与沉淀,现在则直接通过检索古籍数据库,就可查询到所需文献,快速而便捷。数字化新技术的出现,也促使学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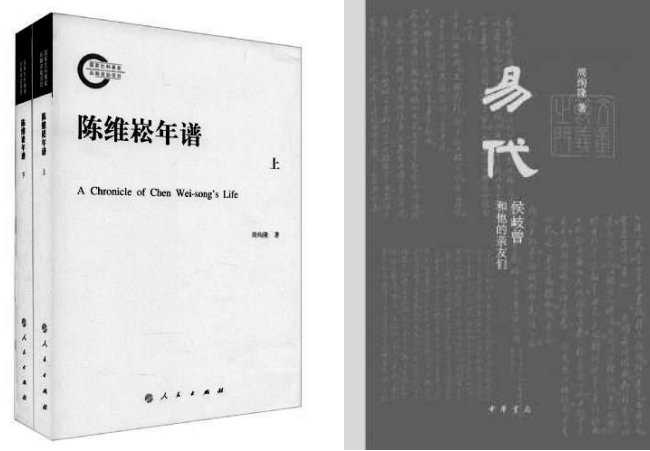
研究视角发生变化,比如以前的一些经验性研究在数字化情境下可以定量研究,提升了学术研究的严密性与精确性。当然,数字化新技术也有可能催生学术研究新方法,这有待于学术界去深入探索。

从古籍中提炼文化精华

学术家园: 古籍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古籍出版是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从古籍编辑出版角度,如何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周绚隆: 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依然需要整合全社会力量,特别是学术力量与出版力量来解决。古籍只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买了书并不等于传承了传统文化,还要通过阅读,秉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吸收有用有益的内容,才能真正做到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

从古籍出版角度来看,古籍所承载的文化内容,往往精粗混杂、泥沙俱下,有传统糟粕,需要文化创作主体与古籍出版主体做深度思考与科学规划,把优秀的内容提炼出来,以一种当代人所能接受的形式进行再创作与传播。早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我就感到,相比经济发展的迅猛,我们的社会在人文道德方面



周绚隆部分学术论著

还存在一些不良现象,特别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与人的空间距离在缩短,心理距离却在拉大,传统农耕社会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和,乡村社会中凝聚人心的纽带,在城市化过程中逐渐淡化,如何提炼这些传统美德,对于提升整体人文道德水平至关重要。于是我主持了“中华传统价值观念丛书”,邀请专家学者就爱国、敬业、友善、孝敬等主题进行编撰。当然,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不仅在出版,还需要在文艺创作与物质生活等领域多方发掘和提炼。如果只把古籍提炼作为一个概念或口号提出来,缺乏现场感,也没有移情的过程,就无法将这些传统美德转化为行为习惯。如何做好传统文化的当代阐释,这对古籍出版来说充满挑战,任重道远。就像“中华传统价值观念丛书”,主要是邀请学者从古籍文献中将奉公守法等相关观点与论述提炼出来,进行注释与阐述,初衷很理想,但呈现给读者的还是偏知识性的内容,不易让读者感动,也不易让读者与现实产生直接关联,策划预期与实际效果存在一定差距。

学术周刊: 对外文化交流中,如何利用古籍出版平台,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古籍出版人,应该做些什么?

周绚隆: 单纯的古籍输出,对于在汉文化影响的国家与地区,是完全不成问题的。但是要想通过古籍出版让世界读懂中国历史、讲好中国故事,还需要发挥文化的作用。就像想要学懂学通一门语言,必须要了解这门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古籍输出就是要输出文化,并且尽量是有形的文化,否则往往会变成鸡同鸭讲。

新时期的古籍出版人,首先要有一种文化责任。出版的目的为解决传播的问题,古籍出版就要出版值得传播的古籍、需求大的版本。传播量不大的古籍,如果是稀缺版本,或者是具有文物价值而无文献价值,可以通过数字化来解决。否则不经甄别,有什么出版什么,就容易造成出版资源的浪费。这就需要古籍出版人常怀一种文化责任感,从众多文献中,甄选出最适合出版的古籍。其次还要有专业眼光,精通古籍出版,对产品策划、产品线等有理念支持。此外,还要具备脚踏实地的精神。古籍出版不能投机取巧、急于求成,编辑不认真,质量就很难保证,这就需要编辑既要有深厚的学术功底,还要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委员 时间

孔子的施教体系与书院精神

杨朝明

《易经》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明以止”是人文教化的目标,“化成天下”以“文明以止”为教化的方向。孔子继承上古三代的历史文化,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包含了系统完备的教化学说,影响中国至深至远。孔子以后,儒家学说成为中华民族的内核精神,自然也是中国传统书院的精神。

《孔子家语》中有一段重要记载,清晰地展现了孔子的教学体系。其中说:“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诗书,而道之以孝悌,说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德。盖入室升堂者,七十有余人。”孔子进行“文德”教育,他培养的弟子都是文德的典范。认真研究孔子的这一教学框架,会发现其中有严密的内在结构,有符合教育规律的深层逻辑结构。

文德教育是孔门教学的灵魂,是儒家教化的中心。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孔子儒学牢笼天下,包容精微,但一言以蔽之,它关心的还是社会的和谐、人心的和顺。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就是儒学教育,它们的方式、方法、路径、目标都与孔子“施教”方法和教学体系深度契合,对今天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极具启发与指导意义。《孔子家语》记孔子说:“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正确的价值体系决定德行的方向,人的德行体现着价值与信仰。没有好的德行,作为价值体系的“道”可能就是模糊的。孔子教育通过文德的培养树立人们的正确价值观。孔子又说:“虽有国之名,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传统的中国书院十分关注国家的道德建设。

古代书院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就像许许多多的文庙一样,书院关注天下时事,与社会直接相通,书院与“占尽天下名山”的寺庙与道观不同,它不会置身事外,远离人间。例如书院大兴的宋代,书院无不讲论经学,将经义推之政事。钱穆先生说:“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日革新政令,二曰开通经学,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离开了对社会的关切,就没有传统中国书院的内在精神。

书院的兴衰与社会思想的变化有关。孔子当初开创私学,继承发展了周代的“官学”传统,探索出了极其成功的教育教学模式,他与弟子们共同组成中国最早的民间学术团体,已经具有了书院的雏形。孔子的教学不拘形式,方法灵活多样,论说修己安人,讲述先王之道。但今天正式意义上的书院还是自唐代开始的,由于科举时代要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很多文人学士要为科举考试做准备,于是有人在山林之间筑起书屋,作读书休闲之用,或者相聚读书论道、修身养性,早期书院就应运而生了。

宋代理学兴起,儒家学者以儒家经典教授于各地,讲学之风大盛,书院蓬勃兴起,于是宋代的书院在规模、性质与功能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既然书院与科举考试有关,这就决定了宋代书院的性质与方向。例如,政治改革家范仲淹从政时设置官学,胡瑗等人则以“明经”“政用”设科讲学。北宋中期理学正式形成之时,以地域为名称的学派先后出现,诸如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苏轼父子的“蜀学”等等,他们讲授儒家经典,彼此相互呼应,成为儒学复兴的重要场所。

谈中国书院的历史发展,自然不能离开朱子。南宋时期,书院文化中影响最大的人物自然就是朱子。朱子在福建建立“闽学”,逐渐形成了他完备的儒学体系,从二程到朱子,其间经过四代的传授过程,他们的学术文化都有书院与之相随。朱子所到之处,他往往着重于兴建书院。有人统计,由于朱子在武夷山生活、学习、讲学、著述时间最长,这里有宋明以来的书院遗址45处,被称为“道南理窟”,这自然与朱子的影响密不可分。直到清初,康熙皇帝依然推崇朱

学,尊之为“学达性天”“大儒世泽”。

在古代书院中,核心的教育与讲学内容当然是《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书院像孔子施教那样以诗书“先”之,原因就在于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所说:“诗、书、义、礼、信,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也就是说,这是由中国经典的性质与特性所决定的。书院教育中特别注重孝悌、仁义教育,注重礼乐熏陶。例如,朱子为白鹿洞书院所写的“揭示”,就代表了书院的特性,说明了书院的教育与教学方式与方向。作为白鹿洞书院的学规,这一“揭示”设有“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包含了丰富的

影响。综观古代书院,将其与孔子的施教体系相互对照,会给我们重要的历史启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统中国讲究“师道尊严”,重视“师道”,就是重视“人道”。传统的教育说到底就是“成人”之教,这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基础与根本。《中庸》说“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发扬传统书院教育的内在精神,对于今天学校教育的救偏补弊,尽快改变当下“道术将为天下裂”“只重智,不重仁”“职业为上,德性为下”之类的弊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书院的功能在于教育,它属于私学,以前都是由著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主持,一般都有自己的教育理念、组织机构、管理章程,这里也是思想的高地乃至高峰。

书院教育与官学教育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这里进行的是通才教育,是通识教育,是人文教育,是素质教育的教育,传统的中国书院进行的是人文教育,“五常”“八德”的教育,对于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挖掘中华文化遗产,发挥着积极作用,这样的教育应该大力提倡、积极推广。今天,注意借鉴传统书院的模式,鼓励书院健康发展,应该视为弘扬传统文化的手段与途径,使之成为“明经义”“正人心”的道场,也有助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孔子研究院原院长)

信息 集萃

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

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国家开发银行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明确了创意设计、演出产业、音乐产业、美术产业、手工业、数字文化、其他文化产业、文旅融合等8个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重点领域,提出了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建立汇聚各方人才的有效机制、加强项目建设和金融支持、统筹规划发展和资源保护利用等4个方面政策举措。(韵文)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引起热烈反响

中国作家协会于3月17日发布“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征稿启事,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已收到300余篇来自社会各界的投稿,其中除了少量大纲,

大部分都是已经成稿作品,有的甚至是几部曲的大部头作品,目前已经收到的稿件近6000万字。作家出版社社长路英勇表示,“创作计划”将持续五年,希望有更多写作者将视角投射过来,聚焦火热的生活,沉下心来,创作出与伟大时代相衬的精品力作。“创作计划”成果要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兼具优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希望最终遴选出的作品是真正的“高峰”之作。

同时,作家出版社将推动“创作计划”成果实现向影视、戏剧、网络音视频等文艺形态和传播介质的IP转化。(谢颖)

中国文联发布《中国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公约(修订稿)》

日前,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国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公约(修订稿)》。《中国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公约(修订稿)》要求全国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爱国为民,心系民族复兴伟业,自觉承担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定文化自信,歌颂真善美,针砭假恶丑,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

值;潜心创作耕耘,创作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精品力作;追求德艺双馨,坚守艺术理想和艺术良知,做到襟怀学识贯通、道德才智交融、人品艺品统一;倡导团结协作上,弘扬行风艺德,树立文艺界良好社会形象;引领社会风尚,弘扬社会正义,践行法治精神,热心公益、乐于奉献。(张丽)

国家京剧院新编历史剧《大漠苏武》完成验收

日前,国家京剧院新编历史剧《大漠苏武》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剧目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倾情上演。该剧以京剧艺术形式展现了苏武北海牧羊的坚韧守望,展现了气壮山河的家国情怀。苏武饰演者张建国不仅运用了蕴藉典雅的奚派唱法与表演,更吸纳了马派、麒派等老生派别的优长,得到现场观众热烈反响。观演专家们表示,国家京剧院阵容齐整、技艺精湛,整体的艺术水准和老中青艺术家的共同演绎,让已经成为民族精神符号的苏武,有了更加丰满的质感,特别是调动京剧唱念做打等艺术手段的整体配合以及把传统典故传奇的内容做了更加丰富的表达,让优秀传统文化的再创造、再转化得以实现。(郭海瑾)



委员时间